

序

刘宏*

笔者有幸与王力坚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曾同事数载，当时亦拜读过他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大作。2006年春夏之交，我在台湾“教育部卓越访问学人”计划下到中央大学客家学院讲学，有缘与力坚兄再度聚首，并得知他开始关注客家社会与文化的研究论题。不久前他告知其新作《新加坡客家会馆与文化研究》即将面世，并嘱我作序。自己才疏学浅，本无资格和勇气接受这一嘱托。但笔者过去对本书的论题曾略有涉及，同时亦希冀通过阅读力坚兄的新作，弥补自己在浪迹英伦四年期间对东南亚华人研究谱系的知识断层。因此，这篇短论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读后感。

本书以新加坡客家社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过去近一个世纪来当地客家人社群的演变及其特征。这个着眼点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功效。这不仅因为社团、学校和报刊构成了华人社会的三大支柱，而且由于社团成为联结华人族群和次族群(sub-ethnic)内部的最主要结构性纽带，并作为地缘和方言群体的代言人参与当地的和祖籍国的社会与政治活动（尤其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本书第一辑的四个章节从历史的和制度的这两个相互交错的层面，对客家人社群的社会和文化活动的形式、内容与特征作了深入而具体的论析。这种分析既涵盖由内及外的局内人的观点和策略，也论及由外及内的社会政治环境如何影响客家人社团的思路和选择。这两种

*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力量之间的互动也是客家人的社群意识和国家意识的形成和演变的主要源泉。

我以为，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把文本(text)和脉络(context)有机地结合，并将之用于理解和阐释新加坡客家人的经验和历程。本书将其论题最重要的文本之一（客属总会特刊）置于时间和空间的脉络之下加以审视，既深入体察文本的内在意义，又超越文本本身，详细讨论它所折射出的华人意识、中国情结和泛时事化等特征。这种分析方法在本书第一辑有鲜明的体现，它也从一个侧面论证了本书受访者李金生先生所提出的“民间档案”的重要性。

本书的论述和访谈也将作者本身的独特经历融入其中。作为客家人，力坚兄出生于中国大陆，在新加坡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多年，此后转赴台湾。这三地不同的文化、政治和族群生态给作者提供了三重视野和关照。例如，生活在台湾的族群政治和强烈客家人意识的大环境下，他很自然地会关注客家人在新加坡的政治地位和作用，并以此作为研究的参照系之一。作者认为，客家方言与族群身份的关系，在两地有非常不同的解读。我觉得，这背后也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和特征。新加坡的民族国家建构工程需要淡化甚至消除次族群的特征，因此，客家社群通过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将自己同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联系在一起。而解严之后的台湾，族群身份和认同似乎变得更为鲜明和强化，社会力量与族群政治互为交织，成为国家政策和政治演变的重要动力。

本书的研究视野、方法和对象皆有其独到之处，它不仅提供了解释20世纪新加坡客家人社群的新思路和新资料（包括作者的口述历史访谈），也促使我们从比较的立场，思考同处全球化时代但又身居不同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客家人意识的内涵和外延。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多层次地解读这种“多元一体性”的努力。因此，我很高兴向所有对客家历史、文化和社会感兴趣的人士推荐《新加坡客家会馆与文化研究》。